

# 面对疫情，艺术何为

■本报记者 张文静

近日，画家陈丹青在其视频节目《局部》中，介绍了意大利锡耶纳阶梯医院中的壁画。在现代医学尚未萌芽的15世纪，阶梯医院里的病人一抬眼就能看到医院墙壁、穹顶上那一幅接一幅光辉美丽的大壁画，在爱与美中得到抚慰。“医道，即是人道。阶梯医院的人道，部分在医生那里，部分就是墙上的壁画。”陈丹青说。

虽然在现代医院中看壁画已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，但在疾病与人类相伴相生的漫长历史中，艺术却从不曾缺席。

## 传递温暖与慰藉

除夕夜，电视里节目播放着，但诗人王久辛却一点也看不下去。他心情郁闷地盯着手机，翻看那些关于疫情的消息。突然间，在朋友圈里，他看到了几张照片，那是解放军医疗队飞赴武汉的情景。那一刻，他感动得热泪盈眶。

王久辛是一名军人，也当了一辈子记者，一直是哪里有危险，就去哪里采访，因为在那里总会有一群人在为了解除危险而奋战着。他把他们称为“最高尚的人”。

零点钟声敲响，电视里演了什么王久辛已全然不觉，他一直沉浸在回忆和对飞赴武汉的战友的想象中。内心的感动让他再也坐不住了，他躲到书房，写下了这些句子：“平时，他们隐匿在辽阔的国土/那熙熙攘攘的人群中/当冠状病毒猖獗，蔓延/随时可能大面积感染/要夺走千万人性命的危机时刻/他们来了，如脱兔般箭射而出……”整首诗写完后，他郑重地写下了诗的题目——《这些高尚的人》。

凌晨3点半，王久辛把这首诗发到朋友圈。令他没想到的是，当晚就有上百人点赞。很快，《光明日报》、《文艺报》、《人民文学》、新华社、网易、搜狐、今日头条等媒体报道转发，这首诗引起广泛的共鸣。

“当疫情突然发生时，诗歌是最能在第一时间发声的文学艺术形式。因为诗歌写作是个人的，它能表达人的思想感情中最真挚、最热烈、最真挚的情感，能表达出人与人之间的热爱和悲悯。”王久辛说。

最近，无论是日本捐赠物资上写的“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裳”“青山一道同云雨，明月何曾是两乡”等诗句，还是日本松山芭蕾舞团的成员演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并高喊“武汉加油！中国加油！”的视频，都令人们感到暖心和感动。“由此可见，文学、音乐等艺术所带来的精神力量是巨大的，艺术能够传递超越国籍的爱，给人们带来鼓舞和慰藉。”

## 记录与反思历史

艺术作品可以展现疫情中人性的温暖，也可以起到记录与反思历史的作用。



戈雅《瘟疫病院》1798-1800年

徐冰《空气的记忆》2003年

“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艺术史也可以被看作是研究、回溯或体验历史事件。”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艺术+科技专业教授费俊说。

比如，画家米希尔·史维特斯所绘的《雅典鼠疫》就生动地表现了公元前430年到公元前427年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发生的那场灾难；14世纪中叶欧洲爆发的黑死病在中世纪的绘画、文学等艺术作品中都有广泛的表现，老勃鲁盖尔于1562年绘制的油画《死亡的胜利》，通过充满死亡气息的场景和具有象征意味的行进的骷髅等形象，记录了这次让人类历史陷入绝望的黑死病瘟疫。

“这些表现灾难的艺术作品一方面帮助我们理解历史和自我警醒，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艺术对于灾难中人性光芒的赞颂。”费俊说。在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邵亦杨看来，很多真正能流传于世的经典艺术作品，不仅能体现出人类共同的情感和人文关怀，还能启迪人们对疾病进行反思。

比如，在基督教绝对统治的时代，老勃鲁盖尔的《死亡的胜利》讽刺了教会面对瘟疫的无能为力，揭示出现实世界的问题是真正的危机源头；意大利艺术家丁托列托在1549年创作的《圣洛克治愈瘟疫病人》，描绘了人们在为应对鼠疫而建造的隔离医院中的情景，令人们

看到在死亡面前肉体如此脆弱，相互关爱才是生存之道；西班牙艺术家戈雅在其关于瘟疫的作品中，敏感地把瘟疫与人为的灾难和疯狂联系在一起，对人们起到警示的作用。

“人们通常以为艺术中描绘疾病、死亡和创痛是消极的，不如表现治病救人的题材积极向上。然而，这些作品用‘失去’来反衬‘拥有’，不仅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对生活的热爱和生命的激情，而且能够揭示问题的症结所在，更具有现实意义。艺术本身就是药。”邵亦杨说。

2003年4月29日，在非典型疫情的关键时候，艺术家徐冰把北京街头的空气封存在一个玻璃瓶里。它看上去轻盈、易碎而又危险，像是一个医用输液瓶，又像是一个传递信息的漂流瓶。

“面对疫情，个人和社会都应该作出深刻反省，回顾历史是一种很好的方式。徐冰的作品就是艺术家邀请观众进行的一次反省。然而不到20年，相似的情况又出现了。历史如何不再重演，这是值得我们好好反思的问题。”邵亦杨说。

## 艺术还能做什么

在王久辛看来，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，诗

人应该发出声音。但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至今，还没有让人眼睛一亮的诗歌出现。“作为诗人，我感到脸红。”王久辛说，“疫情暴发以来产生的诗歌作品，多数是自娱自乐，或者是有感而发的简单表达，普遍缺少精神的高度、情感的浓度、思想的丰富度和艺术的高超度。所以只能感动自己，却无法感动别人。我们有这么多诗人，却写不出鼓舞人的诗歌。”

在王久辛看来，“导致这种现象的最重要的原因，在于很多诗人的情感已经背离了高尚，背离了与人民同呼吸、共命运的情感。这不是最近才出现的情况。中国诗人迎着八面来风，拥抱世界文学，这是对的。但要警惕的一点是，很多诗人‘不屑于表达自我以外的世界’。他们不愿关注民族大义、家国情怀，不去关注大灾大难中的人性，当然写不出好作品来。而这又与近年来诗歌理论界的导向有关系。”

“这场疫情也是对中国诗人的考试，至少到现在为止，是不理想的。”王久辛说。尽管如此，他仍然相信，这次疫情带给人们的深切感受、疫情中高尚的人和情感，是不会被磨灭的，它一定会长留在诗人的心中，由此，诗人也许会在不远的将来产生伟大的灵感，写出伟大的诗篇。“只是我们需要好好想想，我们被什么感动，我们要为什么人写作。用什么样的心写什么样的诗，这是最根本的问题。”

在邵亦杨看来，疫情中的艺术作品可以提出问题，也可以歌颂美好，但这种歌颂必须要找到真正能够感动人的精神内核，否则就会变成用廉价而肤浅的歌颂“消费”疫情。

比如，此次疫情暴发后，就有大批良莠不齐的医疗专家和医护人员画像被创作出来，在邵亦杨看来，“这是对英雄的神化和偶像崇拜，毫无现代意义，是一种创作上的惰性”。“艺术家应该思考如何用作品表达他们敢于说真话、治病救人的精神内核，而不是仅仅画出他们的形象就可以了。”

随着与科技融合程度的加强，在与疫情相关的社会创新领域，艺术家开始作更多尝试。“艺术家可以将创意能力、技术能力与社会责任结合起来，寻求具有社会价值的创新型解决方案。”费俊介绍说，最近在中央美术学院发起的“艺术战‘疫’行动”中，既有大量致敬医务工作者、传递温情和信念的艺术作品，也有不少针对疫情的创新设计作品，比如“可根据个人特征调节佩戴方式的新型口罩设计”“可以自动消毒的公共交通工具”“可以模块化的城市应急救援系统”“可以探测病毒和细菌并具有消毒功能的智能手环”等。

“这些方案的设计、研发以及实施，对于我们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创新是非常有益的，相信在疫情过后，会有一批有价值的方案成为真正的产品或服务。艺术，也能在未来的公共卫生防控提供更好的支持。”费俊说。

## 更客观的认识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历经了SARS、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后，如果中国拍一部传染病主题的电影，您对影片有什么样的期待？  
江晓原：如果跟着现有影片亦步亦趋，只把场景、人物换上中国的，就意义不大了，我期待在新影片中能看到这两点内容：第一，厘清疫情预警的行为界定和发布权限，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应该在电影里有所阐述，《传染病》里稍稍涉及了这方面的内容，但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。电影是适合做公众教育的，体现这方面内容有利于防患于未然。  
第二，在这次抗疫中，国家强力介入后，在大隔离上千部下沉到基层，甚至一家一户落实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，这种治理方式完全超出了西方科幻电影的想象。这种方式应该在电影里有所体现，虽然各个国家情况不同，但中国的做法仍然有借鉴意义。

# 江晓原：疫情电影的正确打开方式

■本报记者 李芸

抗疫期间，疫情电影成为宅家打发时光的选择，近日，《中国科学报》记者采访了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，请他讲述对疫情电影的见解。

江晓原是一位观影爱好者，说起来颇为巧合，他这一喜好源自17年前、2003年的春夏之交，那时正处于非典时期，上海各商店面生意萧条，唯独碟店生意比平常好。带着好奇，江晓原走进了碟店，也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。

如今江晓原不仅收藏了上万部电影，也是资深的影评人，甚至还对科幻进行了学术性研究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因为宅家和疫情，《流感》《釜山行》《传染病》《末日病毒》《卡桑德拉大桥》等一批影片收视率很高，但也有不少人提到这些电影“不够科学”，比如防护不到位、病毒威力夸张等等，您怎么看？  
江晓原：不能指望从电影中学习到准确的科学知识。要知道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现代电影工业，做的是娱乐产品，首先考虑的是观赏性。

有关传染病的电影不多，就因为这类电影先天就有弱点——不够好看。有人吐槽电影里防护不到位，但电影有明星，明星要露脸，穿上防护服，戴上大口罩、护目镜，明星还怎么展示风采？类似问题，在有关外星文明的电影中也经常出现，那些演员无论到什么星球去，都可以不穿宇航服，可以随便呼吸那些星球上的空气。  
好莱坞拍电影也会请科学家做顾问，但顾问的话是能听的听，所谓“能听的话”就是不会增加巨大成本、不会妨碍影片观赏性的话。因此我们不能抱着看科普、科教片的心态来看科幻片。

但是科幻片的科学性有限，思想性却很高。因为在幻想的故事框架下，能营造出极端环境，有利于对人性“严刑逼供”。比如《末日病毒》中，在传染病肆虐下，人性的恶就被激发出来了，还有《釜山行》里对人的情感刻画也属此类。  
这几部影片中，只有《传染病》相对来说“最科学”，其他几部电影的表现重点还是在拷问人性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《传染病》是2011年拍摄的电影，此前豆瓣评分才6.7，被评价为“很一般的科幻片”，现在很多人觉得其中情节应景，把它当“科普片”，还回过头去重新评分。您怎么评价这部电影的思想性？  
江晓原：《传染病》在我的评价体系里，我给它打中上。这部影片有三方面可以启发我们思考：

一是人性的复杂。比如片中官员在封城之前悄悄给老婆打电话通消息，这是违规，也是人性。这种桥段在各种灾难片都有出现。影片中还有药物欺瞒、物资哄抢、疫苗接种顺序等内容的展示。

二是疫情的预警。这部电影花了不少笔墨来讨论疫情最初是如何失控的，为什么第一时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。这跟我们当下的境况有一些类似，我们现在当然要等待官方的消息，不能瞎猜测。但这部电影启发我们去思考疫情预警的发布主体是谁、权限如何、责任如何，“发布预警”的行为界定，预警在准确性与维护稳定上如何平衡等等。

三是治理的手段。我们能看到编剧、导演们想象的社会治理手段，非常软弱无力。我们可以和电影《末日病毒》配套看。《传染病》最终开发了疫苗，平息了疫情。但《末日病毒》演绎的是另一种情况，病毒在全球肆虐，人死了几十亿，社会秩序崩溃，进入无政府状态。幸存的人只能拿上枪，开车到处流浪。《传染病》中也出现了哄抢物资之类的情节，这很有教育意义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电影中的一些桥段，比如生化武器、阴谋论等等，会不会给处在疫情中的公众带来困扰？  
江晓原：电影中的各种思考都是有益的。当我们追溯真相时，多样性的思维可能让我们追溯得更严厉、更彻底、更精密。这就像警察办案，不能有思想束缚。

越是有思想的电影，越需要有人谈论、分析、引导。好莱坞电影，它既不是科普的教科书，也不是道德的教科书，如果说它有优点，那就是还能秉持在一定程度上文化多样性，所以有时候你能看到一些对资本主义黑暗的揭露。当然也能看到美化。

无论是揭露还是美化，你都应该有自己的分析。关键是观影的人，要多考虑，不要把自己的思考集中在一根筋上。

现在我们正处在社交媒体极度发达的时代，也是后真相时代，很多人天天通过看朋友圈来了解社会新闻，这很荒谬。因为朋友圈多是跟你气味相投的人，即使你有理性，也难免会以为社会就是那样。所以要有意识地去矫正这种状态，别让自己成为那个天天看特制《顺天时报》的袁世凯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《大明劫》是关于中国古代瘟疫的一部影片，您怎么评价？  
江晓原：这是一部历史电影，主体内容跟传染病谈不上有太大关系，抗疫只是一段插曲。关于抗疫的描绘，对我们的启发是，得承认中医的成绩是很好的，在西医进入中国之前，中医已经呵护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。这个时候看《大明劫》，让我们对中医有



▲《传染病》电影海报  
▶《末日病毒》电影海报



新年伊始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爆发。有些人在慌乱之中，把今年定性为“灾年”。

然而，在对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、医疗史学者余新忠的专访中，我们可以感受到，从历史反观当下，疫病给人类带来的不只是灾难，更是前进的动力，此次疫情不过是人类对抗疫病的又一个新片段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传染病对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发展有着怎样的影响？  
余新忠：人类的繁衍过程是与微寄生系统不断平衡的过程。

人类最早出现在非洲热带雨林地区，那里物产丰富，同时微寄生状态也特别复杂，这样就导致了一种后果——人可以生存，但不容易形成规模。人类要发展到一定规模，就需要有征服传染病的能力。从历史来看，在平衡博弈的过程中，疫病其实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，这种促进作用得益于人类改造环境能力的增强、医学的进步和卫生观念的形成。

比如，汉代末年瘟疫高发，在这一背景下，张仲景留下了著名的《伤寒杂病论》，针对的主要就是外感性疫病，《伤寒杂病论》的出现说明中国医学对抗传染病的能力在不断提升。到明清时期，不但治疗外感性疫病的温病学得到重要发展，人工免疫方面也有大的发展，天花种痘术（人痘）在明中期，即16世纪上半叶出现，首先在江西、安徽，很快传到江南，进而流传至全国乃至海外，应该说对清代人口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。

中国历史上，人们认识中所谓的“烟瘴之地”也有一个不断南移、西移的过程。秦汉时期，江南属于烟瘴之地，隋唐时期，岭南属于烟瘴之地；明清时期，烟瘴之地西移至云南、贵州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近代以来，疫病是如何影响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？

余新忠：传染病是人类灾难，但也是推进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。  
1810年，坦博拉火山喷发造成孟加拉湾气候变化，导致霍乱病菌发生变异，到1820年前后，霍乱疫情从南亚传到全世界。从1820年到1910年前后，出现了6至8次世界性霍乱大流行。

在对抗霍乱的过程中，西方的流行病学调查、公共卫生防疫体系、对细菌的科学研究都慢慢发展起来。此外，由于西方发现霍乱的流行与水有关，下水道、自来水管等公共设施的建设也开始兴起。

遗憾的是，虽然霍乱对中国社会有所刺激，比如，很快就出现了专门针对这种疾病的医学书籍《霍乱论》（王士雄著），但是中国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出现公共卫生的进步，虽然当时有医生观察到苍蝇在传播疾病中的作用，但也没有形成理论性的思考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在人类疫情史上，“歧视”也一直存在吗？

余新忠：“歧视”问题，比如地域歧视或种族歧视，是疾病“污名化”的一种表现，也是人类疾病史上的普遍现象。这种现象在发生大规模瘟疫的情况下，往往表现得更为明显，而且还可能延展至针对瘟疫的公共卫生行为，检疫制度的实行就是如此。

检疫最早诞生于14世纪中叶的意大利，是为防范黑死病的输入而形成的一种举措，为了不让从疫区来的人上岸，强行让他们先在船上待一段时间。

在近代中国，检疫制度的实行最初由海关负责，而当时的海关主要由西方人掌控，所以在实行过程中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很多种族歧视和矛盾冲突，西方人的种族优越感往往会在有意无意中将中国人，特别是其中的普通民众视为“疫种”，从而采取一些非人性的强制举措，使检疫带有明显的阶级性和种族性。

但是，尽管存在歧视和冲突，检疫制度还是慢慢地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。  
1897年，香港鼠疫大流行，港英政府采取了现代卫生检疫举措，包括清洁、消毒、隔离、检疫四大措施，后来这套方法也在上海公共租界得到采用。

到1911年，东北应对鼠疫疫情时，中国人主动采取了防疫措施，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采用了现代卫生检疫举措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进入21世纪后，从SARS、禽流感、MERS，到这次暴发的疫情，大规模疫情出现的频率似乎越来越高，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，这是为什么？

余新忠：进入21世纪以后，人们感觉疫病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，这一方面是由于现代化进程加快，另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生物性事件的敏感度在提升。

现代化是一把双刃剑。它促进了医学发展，完善了公共卫生防疫体系，有利于人类更好地控制疫情。而同时，交通便利带来的人流量激增以及人口密度增加，又更加有利于传染病的出现和传播。我们统计过清代江南11个县的人口密度和瘟疫发生次数的关系，发现经济社会发展程度、人口密度，一直与疫病发生频率呈正相关。这种正相关性至今仍是如此。

与此同时，进入21世纪后，信息传播技术让消息更灵通，生物检测技术让疫病更容易被发现，于是，现代人能看到的疫情情况更多，对疾病致死的敏感度更高、容忍度也相对更低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透过历史看未来，疫病将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，它又将如何影响或改变现有的社会组成形式？

余新忠：未来，疫病仍将是人类发展的重要影响因子，它会一直困扰着人类生活，但这些困扰也一定会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。

时至今日，我们要让现代防疫体系的发展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。从2003年SARS事件至今，我们的疫病防控体系虽有进步，但进步的程度仍然不够。未来，我们应该努力建设好疫情防控体系，并使能让这套体系发挥作用的治理体制得到配套发展。

疾病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漫不经心或不吸取经验教训。疫病对人类来说是灾难，但如果人类利用灾难来检视自己、反省社会治理和应对举措的问题，就可以将灾难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财富。

南开医学史教授眼中的人类疫病  
■本报记者 倪思洁